

丁元竹：选择“粮食”

本报记者 韩雪

丁元竹：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督学、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社会发展政策、公共政策、发展战略研究。

记者手记

后来者永续其道

本报记者 韩雪

几次约丁元竹委员而不得见，都和疫情反复有关。终于11月3日这天，在厂洼中路国家行政学院东南侧的大图书馆，见到了他本人。

非常巧，前一天的11月2日，正是面前这位社会学家的老师费孝通先生的诞辰日，今年是111周年。

在人类学研究者中，费孝通算是个异数。西方人研究是研究别人的问题，供自己民族所用。费孝通是研究自己的人群和社会，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在同一时代的精英知识分子当中，他也是个异数。知识分子多喜欢撰文以同情的口吻品评底层人民，或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仿佛底层人民是愚昧落后的象征，阻碍了发展和前进。而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最令我震撼的观点之一，莫过于“乡下孩子在教室里认字认不过教授们的孩子，和教授们的孩子在田野里捉蜻蜓捉不过乡下孩子，在意义上是相同的”。在他看来，所谓不如，是环境使然，与智商无关。

综合我个人朴素的见解，费孝通是位开宗立派的学者。跟随其后者，很容易被前人的光芒所遮蔽，显得稍许黯淡。然而，丁元竹对此并不在意。

在1987年冬天，还在攻读硕士的丁元竹，跟随导师来到北京，参加费孝通主持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课题会议。那时改革开放刚进入第10个年头，改革开放进行得如火如荼，各地乡镇企业蓬勃发展。

丁元竹记得，第一次见到费孝通先生，就在北大西南角马路对过的畅春园饭店。会上，他眼见汇集了政策部门、科学院、大学等在内的研究群体共同研究国家层面的问题，那种学术氛围和研究视野令丁元竹深受震撼。会议结束后，他就下定决心报考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1988年，丁元竹如愿在费孝通指导下学习城乡社会学。丁元竹记得，“费孝通先生对学生的教育培养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他新写的文章在发表之前经常要我们研读和提建议，有时也一起座谈，这的确是一个深入学习和思考的过程；二是带我们出差。”

自此，丁元竹开始了一生的追道，也开展了自己的社会学研究。导师的话总在回响并影响着丁元竹：“一个对于民族的生存上没有价值的东西，至多只能做个人的癖好，决不能在社会中站立得很久。”“在他看来学术研究的价值在于‘用得知的知识来推动中国的进步’，否则无异于游戏和玩麻将。”“志在富民”是费孝通学术生涯的内在动力。”……

学术讲究传承，无论是研究成果还是学术情怀，都会在岁月的累积中逐渐厚重，直至不可撼动。而历史车轮滚滚前行，大师不曾逝去，后来者将永续其道。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世纪90年代初，山东日照籍学子丁元竹顺利完成在北京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第二天，他兴致勃勃地去见导师费孝通先生。

费老问起：“你觉得昨天的答辩怎么样？”

丁元竹回答他：“我感觉挺好的，老师们评价都挺高的。”

“小丁啊，你太不懂社会了，人家说你不好，不是因为你不确实写得好，是大家看了我的面子。你是学习社会学的，要对社会有深刻的认识。”

费老又说：“你现在从北大毕业要做老师了，我送你六个字：著书、立说、立人。在北大教书，不著书自然立不住；有自己的著书没有自己的理论逻辑，自然也不能立住；写了书，有了自己的观点，做人不行，最终要完蛋……”

30年过去了，费老已然作古，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小丁”如今已是一位颇有声望的教授。在社会这所大学中研学至今，丁元竹已能深深体悟到老师当年一盆冷水的良苦用心。而今，他不断循着老师的脚步，将自己理解的生活寓于自己的理论逻辑中，不断以经验丰富着理论的内涵，而且他自身也不断从实践中获得新知……

■ 两代政协情缘

费孝通先生与人民政协渊源颇深。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开幕式，费孝通先生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参加了会议。

参会的见闻被他写入了回忆文章中：“现在全国解放了，建立了新国家，共产党能实现什么样的民主？……当政协一开，给了我耳目一新的感觉。在会场上我看见很多人，有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甚至还有戴瓜皮帽的。这些一看就知道是身份不同的人，能够聚在一起开会，讨论建国大事，对我来说真是平生第一次遇到。……我满载而归，有如获得新生。”

这位曾参加过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做过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著名社会人类学家，恐怕不会想到自己的学生丁元竹后来不仅会循着自己的脚步投身社会学研究，也同样进入了人民政协。

到俄罗斯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发展，介绍他如何吸收西洋音乐元素，形成具有俄罗斯文化特点的音乐。不同领域专家的见解，打开了丁元竹看问题的另一个视角。这使得丁元竹对19世纪这个人类发展历史重要阶段的社会和文化特点进一步深化了认识：“原来，民族意识的崛起，不仅表现在政治、社会领域，也表现在文化领域，也具体体现在音乐创作上……”万事皆通此理。

半个多世纪以来，费老和学生丁元竹两代社会学者既关注人类活动、研究人类社会，又都在人民政协这个专门协商机构中为国履职为民尽责，其情真意切，令人称道。

■ “我们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

今年7月底的袁家村之行，给丁元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距离西安70公里、距离咸阳40公里，仅60多户285人的旅游村，一年收入竟然能达到十几亿元，还能吸引5000多人到此打工。尽管已经过去3个多月，丁元竹对这些数字还是熟捻在心，不假思索地随口道出。

“我在村里访谈了10户，家庭年收入最少的是五六万元，最高的能达到五百万元。”袁家村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2007年以来，以乡村旅游为突破口，通过股份制改革，顺应市场经济规律，依靠党员干部引领，把农民组织起来，探索出了一条农村新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子。

丁元竹到这里调研，带着乡村公共服务的课题。经过4天的访谈，他看到这里的农村新集体经济发展，不失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条可行性道路。

当地通过传统小吃弘扬传播了关中文化，不光集纳了全国各地100多种小吃，还作出了商业模式的设计：一条街上100多家小吃店，不能出现同类型的两家。但同时，每家店也不能一家来经营。“村里将店铺盖好，锅碗瓢盆等一应俱全，你带着手艺来做，实行的股份制也有自己的分配设计：按照市场规模，一家店需要投资500万元，那么你最多出资100万元只能占到20%的股份，剩下的400万元，村里动员村民入股且低收入家庭优先。这样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低收入家庭既可以参与分红，也可以参与经营过程。而商分红的20%，要交给村集体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这种股份合作方式，发展成果让全体村民共享。这真是农民的创造！”丁元竹最后一句话，令人想起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于农民儿子和教授儿子所做的评价，农民有农民的环境，教授有教授的环境，差异性与智商无关，不过是环境的熏染。

在袁家村，丁元竹注意到每家小店铺前都挂有一块牌匾，上面注明了原材料产地和联系电话，有的店甚至还以诚信承诺书方式，向顾客发了一份“毒誓”：“如果羊血掺假，甘愿祸及子孙。”“以上内容真实可靠，如若违背甘愿后辈受穷。”……农民以这种诚信为本的朴素价值观，质朴地维护着袁家村的品牌形象。有人问及这种模式能否在更大范围内得以推广时，语调平缓的丁元竹却罕见地变了讲述，出其不意地提了个问题——

“我现在一直在怀疑我们的一种思维方式：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一干什么事，就问这个事能不能推广？作为地方官去造福百姓，把当地搞好，难道不是分内之事吗？做好工作的同时，能对他人形成启发就不错了。为什么我们做事都想着要向全国推广呢？”

他反问的声音不大，却足以对某些固有观念形成撼动。丁元竹是研究社会的学者，很清楚中国差异之大。“其实我在看这个传统村落前，在山东看过一个城中村，当地的村民也挺富裕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如果寻找两个村子的共同点，丁元竹认为就是两个村的党支部书记都是典型的能人。

“为什么不能照搬照抄成功模式？这里面有个因地制宜的问题。”各地条件不一样，但都有能人，能因地制宜地设计出符合当地实际、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产权明晰的新集体经济。

袁家村党支部书记郭占武也说了同样的实话：“其实我们往外输出的不是模式，是我们的一些理念。比如怎么样共同富裕的理念、怎么设计新集体经济的理念。而这些东西，不是说照搬照抄就能掌握的。”近年来，袁家村多有模仿者，但鲜有成功者。

“我想，是不是包括我们官员、学者、媒体都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输出模式？还是真正解决老百姓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丁元竹跟着费孝通先生做乡镇企业调研时，费老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都说浙江模式和江苏模式不一样，同样是致富，到底不一样在哪里？”

丁元竹和另外两位学者为此在江苏住了一个多月。其间有一天，他们坐在村工厂里跟会计正聊着天，来了一个浙江人要买丝。付款时，浙江人打开保险箱，里面装了整整一箱现金。

会计问：“你怎么不转账？”“我一个个体户转什么账？”……江浙差别，一目了然。

“不管是集体经济方式还是个体经济方式，最终是让大家富裕起来。”举出例子的用意，丁元竹显然不仅在于证明中国地域之广、差别之大，他继续追问：“我们目前培训的基层干部是县处级。有没有可能把村干部和居委会主任们培训一下，让他们更加具有开拓创新的能力，适应当前的乡村、社区发展？”

■ 见证质朴

丁元竹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费孝通先生的著作和生平。在对其早期著作进行收集编辑时，丁元竹发现了一位外国研究者在《费孝通和革命中国的社会学》中提到费孝通在英国论文答辩后，还没拿到博士学位就启程回国。恰值1938年日军占领了广州，费孝通只得借道越南进入昆明。书中所述，回国经历颇费了一番波折。

后来在向费孝通先生求证这段经历时，丁元竹问了一个现在看来很普遍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在那个时候回来？”他也得到了一个在当时更为普遍的答案——“那时候，大家好像学了就应该回来，极少去想回来不回来这个问题。”

一问一答间，让人蓦然发现，立在人类活动背后的那幅时代巨幕，人类的悲欢离合和国家前途命运莫不与之相关。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沉沦激起了全体中国人探索中国前途和命运的热忱。自此，“学以致用”的治学态度成为1840年以来中国学术界的核心话题之一。

留下的文字远比讲过的话，更能长久地留存和证明治学者的质朴。

费孝通在《再论社会变迁》一文中写道：“学术尊严！我是不懂的，我知道的是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学术可以做装饰品，亦可以做粮食的。若叫我选择，我是选择粮食。”

翻阅丁元竹的学术文章，也能找到承袭自费孝通的治学观念——以知识的有用性焕发学术的生命力。

观察社会并对其展开研究的这近30年来，丁元竹的关注点都契合了当下的时代命题。《机遇与挑战：WTO下中国社会发展的若干问题》《非典事件在战略上给了我们哪些教训》《从国际经验看当前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软实力”产生于文化吸引力》《志愿服务活动：类型、评价与管理》《中国社会安全网再造》《社区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循着刊发文章著作的关键词，几乎可以拾拾起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有标志意义的诸多节点。

1991年，丁元竹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当老师。1996年他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做研究，2008年再到国家行政学院做决策咨询部副主任……大部分时间都在做政策咨询和政策研究，他因此对现实问题政策问题有着较高敏感度。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能仅仅坐在书斋里，必须到实地去，看看实际情况到底怎么样？在实地调研基础上，把情况搞清楚、写出来，提出自己的思考和建议，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

他关注的当前党和国家发展中的重要议题，也是实际生活中人们必然要面对的问题——

去年，丁元竹关注因社会关系扭曲造成的矛盾问题及其解决对策，出版了《以交流与沟通重构社会关系模式》一书；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社会疏离，对于公共空间和社会关系模式的改变和挑战进入了他的研究视野；近来，面对社会矛盾和社会呼声，互联网游戏产业发展背后的政府管理体制和社会治理机制应当如何完善，他也几次撰文发声……

社会学者当如何治学？

丁元竹的回答同样质朴：“社会学者不仅要紧跟时代，更要回应时代之问，用知识对民族生存发展产生一些价值，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当然，要达到这个目标，离不开个人在其间著书、立说、立人的努力。”